

錢辛楣先生年譜

錢竹汀先生行述

唐石經考異（附補遺）

經典文字考異

聲類

壹

嘉定

錢大昕全集



嘉定錢大昕全集

顧廷龍敬題



顧廷龍題簽

嘉定錢大昕全集工作委員會

顧問 王忠明 潘志純 王榮華 趙昌智

主任 張振德

副主任 張繼中 倪所安

委員(以姓氏筆劃爲序) 周時華 陳愛華 張大明 張文德 顧思明

嘉定錢大昕全集編輯委員會

學術顧問 戴逸

主編 陳文和

編委(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永平 田漢雲 祝竹 孫永如 孫開萍

孫顯軍 華強 陳文和 張連生

繫榮古藉整理事業
弘揚民族優秀文化

嘉定錢大昕全集
出版法慶

錢其琛

一九九五年

二月廿六日



錢大昕畫像



潜研堂



陳文和 主編

錢大昕全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嘉定

錢大昕全集

壹

序 言

戴 逸

錢大昕的全集即將出版，這是繼承歷史遺產，宏揚民族文化的一項舉措，值得歡迎，值得慶賀。由於錢大昕一生著述宏富，整理彙編他的全集是相當艱難的任務。陳文和同志等竭數年之力，標點校勘，搜羅增補，勤奮從事，得以藏功。學術界應該感謝他們的辛勤而有意義的勞動。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生於清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逝於清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年），他是十八世紀中國的傑出學者，乾嘉時代的史學大師。青少年時代成長在文化氛圍濃郁的江南地區，就學於蘇州紫陽書院，與王鳴盛（錢之妻兄）、王昶、曹仁虎等同學，詩名甚著，號稱「江左七子」。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清帝第一次南巡，錢大昕迎駕獻賦，特賜舉人，任職內閣中書學習行走。十九年會試中式，在翰林院、

詹事府任官，曾赴山東、浙江、湖南、河南爲鄉試考官，又任廣東學政。他在北京長期任職於清閑部曹，「在京都退食之暇，唯以經史自娛，討論異同，貫串古今，丹黃不去手，既專心於著書」〔潛研堂詩集序〕，與王鳴盛、王昶、紀昀、朱筠、戴震、趙翼、盧文弨、翁方綱、錢載等當時名流切磋學問，自稱：「一旦辭家而仕於朝，與賢士大游，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邸，出或同車，居則促膝，收直諒之益，極談讌之歡，經年累月，無間寒暑……故嘗謂朋友之樂，唯京朝官所得爲多。」〔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炙硯集序〕

乾隆四十年以後，錢大昕辭官回鄉，不復出仕，專心著述，先後擔任南京鍾山書院、松江婁東書院、蘇州紫陽書院院長，居蘇州尤久，與著名學者段玉裁、孫星衍、顧廣圻，詩人袁枚及弟錢大昭，侄錢塘、錢坫游，講學問難，游山賦詩。當時，與錢大昕青少年時同學的嘉定王鳴盛、青浦王昶亦辭官歸田，「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於吳中，諸弟子執經載酒，稱爲『三老』」（王昶錢大昕墓志銘）。其門下弟子二千人，著名者邵晉涵（攻史學，浙江主考時所取舉人）、李文藻（攻版本、金石，山東主考時所取舉人），以及書院學生李銳（攻天算）、夏文燾（攻輿地）、朱駿聲（攻說文）、孫星衍（攻經學、版本、金石）、鈕樹玉（攻說文）、張燕昌（攻金石）、潘世恩等。錢大昕逝世時七十六歲，晚年自題其像贊「官登四品，不爲不達，歲開七秩，不爲不年，插架圖筴，不爲不富，研思經史，不爲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亦仕亦隱，天之幸民」，反映了這位宿學者儒，生當太平盛世，生活優適，樂天安命，嗜於著述，瀟灑曠達的情懷。

錢大昕學問淵博，考辨審實，造詣精深。當時人江藩稱：「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即錢大昕）爲第二人』，蓋東原（即戴震）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肆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即鄭康成）以下，即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漢學師承記）近人陳寅恪稱錢大昕「洵爲清代史學家第一人矣」（金明館叢稿第二本，二十三頁）；金毓紱稱他「援引精確、分析入微，爲前人論史書中所罕見」（中國史學史）。

錢大昕的著作甚多，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家塾刊刻潛研堂全書所收著作即有二十二種，遺漏未收者尚多。他的代表作當推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詩續集十卷。

錢大昕的重大貢獻是運用實證的方法系統研究了中國歷代史籍。中國歷史學極爲發達，史籍記載，汗牛充棟，即紀傳體正史，自史漢以下，綿延不斷，這是一筆十分豐富的文化遺產。以前學者，撰史者多而評史者少，評史者又多議論體例，書法或褒貶古人，對已有史書作考證、補遺、糾謬者更少。宋明理學家的流弊是「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視浩如烟海的史部著作爲畏途；清代漢學家視治經爲正途，認爲史學是粗學、雜學。在乾嘉時代，有三位傑出的學者提倡史學考證，實開風氣之先。這就是廿二史考異的作者錢大昕、十七史商榷的作者王

鳴盛、廿二史札記的作者趙翼，他們開啓了近代歷史學考證的先河，三書各有特色，而錢大昕的著作尤其博洽精當。他少年即嗜讀史書，「反覆校勘，維寒暑疾疢，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於別紙」（廿二史考異序）。四十歲開始編次廿二史考異，五十五歲完成，可說是竭盡了半生的精力。此書對歷代正史作了全面的考證、辨異、校勘、補遺，本着詳今略古的原則，尤詳於新唐書、宋史、元史，考證此三史之篇幅占廿二史考異全書的百分之四十七。

錢大昕堅持歷史學秉筆直書的傳統，「據事直書，是非自見」，不必畫蛇添足，多加褒貶議論。他說：「夫良史之職，主於善惡必書，但使紀事悉從其實，則萬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別爲褒貶之詞？」（潛研堂文集卷十八續通志列傳總叙）他批評歐陽修的新唐書，朱熹的通鑑綱目。新唐書宰相表記載宰相之死，「有書薨、書卒、書死之別，欲以示善善惡惡之旨。然科條既殊，爭端斯啓。書死者固爲巨奸，書薨者不皆忠讜，予奪之際，已無定論。紫陽綱目，頗取歐公之法，而設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奪其謚。書法偶有不齊，後人復以己意揣之，而讀史之家，幾同於刑部之決獄矣」（廿二史考異卷五十六）。

錢大昕認爲：紀傳正史，凡官修之書，成於衆手，限於時日，故紕謬較多，尤以宋史、元史爲甚，宋史冗叢無章，編次失當，北宋部分因有根據，質量尚好，南渡後七朝最差，「寧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詳，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十駕齋養新錄卷七南渡諸臣傳不備）。至於元史更爲陋劣，「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因開局修

史，僅三百三十一天成書，主編宋濂、王禕皆「詞華之士」，不諳史法，「徵辟諸子，皆起自草澤，迂腐而不諳掌故」（十駕齋養新錄卷九元史）。「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同上）。錢大昕頗有志重新編撰元史，已有部分成稿，但迄未完竣。

錢大昕考證諸史，尤以輿地、官制、氏族爲多。如論晉南遷後僑置州郡，初不加「南」字，至劉宋禪代後，始加「南」字，而唐人不察，修晉書地理志，俱加「南」字，使得許多地名都弄混了，「史家昧於地理，無知妄作，未有如晉志之甚者」（十駕齋養新錄卷六晉僑置州郡無南字）。又如漢代分封同姓與異姓侯王甚多，漢書稱侯國二百四十一，但僅能指名一百九十四，錢大昕作侯國考，列舉其封邑所在和始封姓氏又補充漢書失載者二十五人。又廿二史考異指出漢書中年代、封號、地望之錯誤十六處，但這些是否真是錯誤，尚存疑問，後來得見北宋景祐本漢書，證明錢大昕的考證都是正確的。又如研究歷史人物必須弄清他的出身、民族，否則便會張冠李戴，歷代史書中的舛誤不一而足：「有一人而兩傳，若唐之楊朝晟，宋之程師孟，元之速不臺、完者都、石抹也先、重喜者矣；有非其族而強合之，若宋紀以余晦爲玠子者矣；有認昆弟爲祖孫，若元史以李伯溫爲穀子者矣。至於耶律、移剌本一也，而或二之；回回、回鶻本二也，而或一之。氏族之不講，觸處皆成窒礙。」（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錢大昕化費了大量精力以文獻和碑刻資料糾正補充了歷代史書中關於人物世系的許多舛誤和遺漏。他學識之廣、考證之精，人所共推。故陳垣先生說：「從前專重考證，服膺嘉

定錢氏。事變後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陳垣與方豪書）

對錢大昕考史補史極有裨益的是他在金石學方面的造詣。他到處訪求碑碣，京官俸祿微薄，他卻不斷去琉璃廠，購置許多金石拓片。「至身所經歷，山厓水畔，黌宮梵宇，有斷碑殘刻，必剔蘚拂塵，摩挲審讀，或手自椎拓，積三十餘年，遂成巨富。」（竹汀居士年譜）他五十二歲時，有一次興致勃勃地和學生孫星衍從南京同往茅山訪碑，過道觀，探山洞，在斷垣殘壁中尋碑訪碣，寫了一篇游茅山記，尋幽懷古，極富情趣。他又到過寧波天一閣，讀所藏碑拓、編天一閣碑目，收拓片五百八十餘通。又畢沉在陝西得碑七百九十七通，編關中金石記；阮元在山東得碑一千七百餘通，編山左金石志；嚴子進編金陵石刻記；錢大昕撰寫序言。王昶編金石萃編他亦得寓目，由於他精通金石學知識，對勘古書「舉生平所閱經史子集，證其異同得失」，故所獲甚豐。例如：北京琉璃廠出土遼薊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內貞的墓志，而遼史失載，錢據此碑補正遼史的列傳和百官志；又如元史有譚資榮、譚澄父子的列傳，而世祖本紀中有覃澄，究竟是「譚」或「覃」，大昕蓄疑於心，後來見到山西發現的碑文中有「交城縣長官覃澄」，山東發現的祭濟瀆碑中有「總管覃澄」，濟祠投龍簡碑中又有「總管覃侯」，「總管覃澄」的記載，有了這些證據，錢大昕得出結論「可證資榮父子本姓「覃」，而傳作「譚」者，誤也」（廿二史考異卷九十八）。類似這種以碑補史之例，不勝枚舉。日積月累，錢大昕爲所見碑碣撰寫跋文，編金石文跋尾一書，其妻兄王鳴盛爲此書作序。王認爲：「古來以金石學名家

者七人，宋之歐陽修、趙明誠，明之都穆、趙岷，清之顧炎武、王澍、朱彝尊，「最後予妹婿錢少詹竹汀，潛研堂金石跋尾，乃盡掩七家，出其上，遂爲古今金石學之冠」（潛研堂金石跋尾序）。

錢大昕在挖掘歷史文獻方面，也有很多貢獻。元秘史一書爲記載成吉思汗時代的第一手資料，本爲蒙古文，漢譯俚俗，人多不識其價值，四庫館臣稱其「傳聞之詞，輾轉失真」。錢大昕卻獨具慧眼，盛贊此書「叙次頗得其實」，「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于此書執其衷歟」（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元秘史）。此後元秘史遂爲治元史者所必讀。他又從蘇州玄妙觀的道藏中，鈔錄出長春真人西游記，此書記述長春真人丘處機應成吉思汗之召，西行至中亞細亞，丘的弟子李志常撰述。時人不識此書，甚至以爲是吳承恩所作小說西游記，錢大昕加以糾正，力薦該書「於西域道里風俗，足資考證」（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跋長春真人西游記）。

錢大昕亦頗留意於當代學術史，熟悉康熙到乾嘉時代的學術源流，曾爲許多學者寫作傳記或墓志銘，包括閻若璩、胡渭、萬斯同、惠士奇、惠棟、陳祖范、王懋竑、江永、秦蕙田、王峻、戴震、王鳴盛、曹仁虎、陸錫熊、李文藻、邵晉涵等，這些都是清代學術界的中堅。錢大昕詳細記述了他們的言行著作，評論其學術成就，均深入切要，研究清代學術史者不可不讀。

錢大昕在音韻學方面亦有重大貢獻，他致力於古聲母研究，提出古無輕唇音、舌上音。凡輕唇音，古人必重讀，如匍匐作扶服、文作門、方作旁、封作邦、勿作沒。他從古文獻中找到

六十五個例證。他又說：「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床無別也，束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十駕齋養新錄卷五）故冲讀如動，竹讀如篤，追讀如堆，陳讀如田。他從古文獻中找到三十個例證，援引廣博，無懈可擊。二百年後的今天，山東銀雀山與湖南馬王堆出土的簡帛中使用的古字，又一次證實了錢大昕之說。有人問他說文所列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古代經典中僅見十之四，何以說文所收多為經典中不用之字。錢大昕回答：今世所見經典已將字體劃一，而當年許慎所見乃漢儒各家之說，師承不同，故所傳經典多異文。許慎采錄齊備，載入說文，故今所見不用之字，很多是當年經典的異體字。他列舉出三百多個異體字，并一一與今本通行字對合，以證其說。錢大昕說：「今人視為隱僻之字，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叔重（許慎）取其合乎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著書名，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抉擇。此許氏所以為命世通儒，異於專己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真者也。」（潛研堂文集卷十一答問八）錢氏列舉大量證據，證明自己的說法，故能令人心折。

錢大昕還精於天算曆法，在京結識著名天算家何國宗，何久在欽天監任職，是前輩學者，已官至尚書。聞錢大昕之名，主動往訪，時錢僅二十多歲，「與之論宣城梅氏（梅文鼎）及明季利（利瑪竇）徐（徐光啓）諸家之學，何輒遜謝，以為不及。出語人曰：今之賈逵也」（清代七百名人傳一六三九頁）。錢在天算方面的成績主要是對劉歆的三統曆作了整理、疏解。三統曆

存於漢書律曆志中，是我國保存下來的最早曆書，但內容深奧，文字晦澀，讀者難明其意。錢大昕細心爬梳，寫成三統術衍一書，對其推步原理與測算之法作了詳細說明。他在研究中提出「步星紀年」、「太歲太陰」等問題，為後來天算家研討的熱點。錢氏又對歷代正史最為艱深的天文、律曆志進行了考證述評，為研習古代天算曆法者掃除了障礙。晚年，與治史相配合，又撰成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

錢大昕出生於雍正六年，第二年（雍正七年）正好發生了呂留良的文字獄，此時，文字獄繁多。乾隆初年，號稱寬簡，但乾隆十五年發生偽稿案，這是一次羅織極廣、株連數省的大案。錢大昕時年二十二歲，此後，文網愈密，迭興大獄。錢大昕在京服官時期，正是歷史上文字獄最多、最奇的時候，四庫館亦大舉禁毀書籍。這種長期的、大規模的迫害不能不在知識分子心靈上留下嚴重的創傷。「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士大夫都不敢談論現實和撰寫歷史。不甘心沉默的人，十分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心聲與抗爭。如戴震借疏證孟子，闡發經義、發表反對宋明理學的哲學見解；曹雪芹建構一座虛無縹緲的大觀園為一群天真爛漫而飽受壓迫的弱女子安身立命；袁枚以抒寫性靈批判傳統的詩教；鄭板橋在書畫中寄托放達不羈的個性。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以不同的形式反對封建禮教。錢大昕和他們幾乎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和戴震、袁枚還是論學談詩的好朋友。他的特點是：畢生精力，盡瘁學術，尤其是史學研究，重視考據，提倡實證，不作空談，既不作修身養性的說教，亦不涉內